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式已由高速发展转变为了高质量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重污染行业企业立下汗马功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同时，高速地发展也导致了重污染企业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大众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如今，经济发展形式已经转变，各行各业都寻求高质量发展模式，将其在高速发展阶段未重视到的问题相继解决，很多问题得到了改善。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却一直表现平平，作为企业环境工作的最终成果，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亟待提升。当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问题与许多因素有关，本文从外部监督者的角度入手，选取能够给企业造成舆论压力的媒体，以及擅长利用自身专业技能挖掘、解读企业信息的分析师这两个重要的外部监督角色，研究其对重污染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并将高管权力这个企业内部因素引入，分析其调节作用。此外，本文还考虑了产权性质与法制化水平异质性影响，多层次、多角度地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研究。

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文献，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研究假设。参考权威学者的相关研究和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法规，构建了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评价体系。样本选取自 2012-2021 年沪深 A 股重污染上市企业，实证分析了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高管权力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同时检验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本文发现：媒体关注、分析师关注这两个外部因素显著促进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高管权力能够削弱媒体关注、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更明显；与法制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相比，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促进在法制化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最后，结合以上分析，本文对外部监督者、企业和政府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总结了研究的局限性并表示了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媒体关注；分析师关注；高管权力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hifted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tage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heavy polluting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and we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behin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 rapid development has also led to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heavy polluting enterprises, which have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many area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Nowadays, the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hanged, and various industries are seek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ls to address problems that were not emphasized during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stage. Many issues have been improved as a result.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disclosur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heavily polluting industries have always been mediocre. As the ultimate achievemen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work,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urgently needs to be improved. Of course, the issu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supervisors, selects media that can exert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on companies, and analysts who are skilled in using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o dig out and interpret corporate information. It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se two important external supervisory roles on th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The article also introduces the internal factor of CEO power and analyzes its moderating effec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level of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udies the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levels and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synthesizes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gency theory, and stakeholder theory, and proposes research hypotheses. Referring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 conducted by authoritative scholars and policy regulations issu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stablish a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sample is selected from heavily polluting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12 to 2021.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oles of analyst attention, media attention, and CEO power in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hile

also testing the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of the regression result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media and analyst attention, two external factors, will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heavily polluting listed companies; CEO power can weake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media and analyst attention on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media attention and analysts' attention have more obvious promotion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Compared with regions with low legalization level, the promotion of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media attention and analysts' atten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regions with high legalization level.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external supervisors,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ummari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nd expresses the outlook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dia attention; Analysts pay attention; CEO power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IV
第一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3
§1.2.1 理论意义 3
§1.2.2 现实意义 3
§1.3 文献综述 3
§1.3.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3
§1.3.2 外部监督研究现状 5
§1.3.3 高管权力研究现状 7
§1.3.4 文献述评 8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8
§1.4.1 研究内容 8
§1.4.2 研究框架 9
§1.4.3 研究方法 10
§1.5 研究创新 11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12
§2.1 概念界定 12
§2.1.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12
§2.1.2 外部监督 12
§2.1.3 高管权力 13
§2.2 相关理论 14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14
§2.2.2 委托代理理论 15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15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7
§3.1 外部监督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17
§3.1.1 媒体关注的作用 17
§3.1.2 分析师关注的作用 18

§3.2 高管权力、外部监督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18
第四章 研究设计 20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
§4.2 变量的选取与界定 20
§4.2.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20
§4.2.2 外部监督 22
§4.2.3 高管权力 22
§4.2.4 控制变量 23
§4.3 模型设定 24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26
§5.1 描述性统计 26
§5.2 相关性分析 27
§5.3 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28
§5.3.1 外部监督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28
§5.3.2 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30
§5.4 稳健性检验 30
§5.4.1 改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衡量方式 30
§5.4.2 改变高管权力衡量方式 32
§5.4.3 增加控制变量缓解内生性 34
§5.5 进一步分析 36
§5.5.1 按产权性质分组 36
§5.5.2 按法制化水平分组 37
第六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40
§6.1 研究结论 40
§6.2 相关建议 41
§6.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42
参考文献 43
致谢 48
作者在攻读硕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49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GDP 连年上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逐渐增高。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我国经济的腾飞与工业化水平的高速提升密不可分，但是早期工业的发展几乎没有考虑工业区所在地的环境问题，特别是金属冶炼业、造纸业、医药制造业等我国相关重污染行业所在地域的环境恶化态势十分严峻，河流中出现“黑水”、土地中污染物指标严重超标等现象频出。随着环境污染状况越来越严重，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也愈来愈重视环境问题。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中，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被写入政治报告，将环境治理提高到了国家层面。2020 年 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中《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被审议通过。紧接着，生态环境部于 2021 年 12 月 11 日印发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2021 年 12 月 31 日，生态环境部根据《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与《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印发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准则》已于 2022 年 2 月 8 日施行。其中《准则》中明确规定了哪些企业需要依法披露环境信息以及披露时限要求、披露渠道、披露内容、违法后果等。有关环境信息披露法规的接连制定，表明了中央对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也体现出了国内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急需提升。关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制定科学的法律法规是一方面，相关企业主动且详细地披露更为重要。国外许多发达国家通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来进行环境监管与治理，在环境治理措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贺宝成等，2022）[1]。从这些欧美国家的实施效果来看，完备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推进了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增强了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信息的积极性，强化了企业的减排意识。但对于国内重污染企业而言，由于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处在高速发展阶段，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不少的环境问题被忽略。故此，由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完善程度不高，鲜有企业具有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意识，因此饶是近年来各部门不断推出众多相关制度法规，也难以迅速改善国内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普遍较低的情况。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可以帮助外界了解企业的环境会计数据和信息，能够给社会大众、政府等提供一个有效的监督渠道（陈璇等，2018）[2]。因此，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有助于各方对企业环境管理的监督。反过来，外部监督的压力又能够给信息披露质量带来积极

影响，促使企业履行其环保责任。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类进入了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丰富，科学技术水平也随之提升，这让我们迅速地步入了信息化时代，经过多年的追赶，我国的信息化发展程度也到达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报纸、杂志、网络等大众媒体的发展日益成熟，媒体的外部治理效应也随着信息化的发展，逐渐成为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监督的重要渠道。媒体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它能够利用自身的职能特征调查、报道上市企业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从而引发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它充当了社会大众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桥梁”作用，可有效减少企业披露内容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并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给予企业不容小觑的外部压力（张建平等，2022）[3]。证券分析师（以下简称“分析师”）作为专业群体，也能够在金融市场中起到“信息中介”的作用，与媒体不同的是，分析师能够依托自身的专业知识，获取、整理并分析上市公司的各类报告、会议、新闻中的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可以为中小投资者提供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故此，众多投资者都会在进行股票交易前参考分析师出具的报告，分析师建议是其重要的参考内容（Graham 等，2005）[4]。在绿色经济时代，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也是衡量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Chang，2013）[5]。那么分析师对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解读与评价，能够识别企业在此方面的违规操作，给予上市公司一定的外部压力，也可以起到相应的外部监督作用。

企业高管作为公司的最高经营管理者，其决策影响着企业的战略方向和资源调配，公司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都与高管权力密不可分（伊力奇等，2020）[6]。适当的高管权力可以使企业的统一性更高，管理层的决策更容易贯彻落实，使公司“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去”。而若高管权力过大，则易缺乏内部监管，从而导致高管倾向于利用自身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而这种意愿常常是以牺牲一部分企业利益为代价的。而由于企业披露其环境会计信息必然会付出一定的资金与人力，这就有可能导致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成为高管以自身权力谋私的代价。再加上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普遍偏低，政策法规制度不全等原因，即使在媒体、分析师等外部监督者对企业的披露信息进行监督的情况之下，过大的高管权力也会对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此时讨论高管权力、外部监督以及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企业外部的角度出发，以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为背景，研究媒体监督与分析师监督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当企业高管的权力过高时，高管权力如何调节外部监督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之间关系。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在这个环保理念深入人心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了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学者们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包含对内部影响因素的研究和外部影响因素研究两方面，但鲜有研究者将内外部因素进行结合分析。很大一部分研究者仅着重分析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的其中一种。

因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并将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内部因素及外部因素相结合，分析外部监督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是否具有积极作用。并进一步研究当企业内部高管的权力过大时，外部监督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因此，本文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较新的思路，同时丰富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外部监督、高管权力三者内在关系的相关文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2.2 现实意义

粗犷式的工业发展使得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如，2005 年 11 月，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2007 年 6 月巢湖山滇池蓝藻爆发；2008 年 6 月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等。严重的污染问题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甚至危害周边居民的健康，故此，近些年国家大力提倡生态环境治理，对于在环境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愈发受到重视，国家接连制定有关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政策法规，社会大众也越来越关注上市企业的披露质量。本文以国内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媒体关注、分析师关注这两种外部监督压力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着怎样的影响，以及高管权力这个内部因素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可以促进媒体和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使其更有效地监督重污染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同时也可以提醒企业及时关注自身内部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着不利影响的因素，双管齐下，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和我国环境治理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3 文献综述

§1.3.1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由于国外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较高，自然资源开发程度与环境污染程度较中国而

言更为严重，国外的一些专家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1971 年英国教授 F.A.比蒙斯发表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这篇文章，揭开了环境研究的序幕，它标志着国外学者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正式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国外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理论体系已经相对成熟。

1992 年，葛家澎与李若山两位学者在权威期刊《会计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Green Accounting Theory）》，他们在文章中介绍了欧美发达国家环境会计的起源与研究现状，并对我国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发展进行了思考[7]。五年后，孟凡利（1997）于《会计研究》上发表了《环境会计概念与本质》一文，并在文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环境会计本质的理解，他认为：环境会计是根据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若干种计量手段及属性，反映和控制一个企业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管理工作[8]。这两篇文章的接连发表将环境会计理念引入我国，此后我国的学者开始了环境会计的研究。

（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Ellis G et al.（2005）[9]分析了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2000 年的内部环境政策声明及年报之后发现，环境敏感型企业要比其他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Bae（2014）[10]考察了 1995-2005 十年间美国的电力公司参与能源部自愿登记温室气体排放项目（VGGR）的面板数据，旨在分析私人公司和政府所有的公司是否有不同的自愿披露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在政府监管、社会大众关注、市场压力下，积极利用自愿披露的策略来获得经济利益。David et al.（2017）[11]以实证分析的方式研究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企业绩效能够对环境信息披露产生影响，但二者之间不是线性相关的关系，这种影响最初随着企业绩效增加，然后逐渐下降。

我国学者李晚金等（2008）[12]通过实证的方式分析了 201 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结果显示法人股比例、公司规模、绩效等因素对环境会计信息有着重要影响。郑飞鸿和郑兰祥（2018）[13]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比较杂乱，环境信息披露奖惩机制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等问题，通过对沪深两地多个行业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之后得出：资产负债率、委员会设立个数、所处区域以及总股数等因素对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朱炜，孙雨兴，汤倩（2019）[14]研究后得出结论：（一）环境表现能够促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二）企业外部压力对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具有强化作用；（三）国企与非国企之间差异明显，国企对于政府环境管制等外部压力更为敏感，非国企则更易受到内部压力的驱动。苏利平和张慧敏（2020）[15]选择 2015-2018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关于股权融资成本、政府监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研究，得出股权融资成本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着负向的影响，政府监管

能够积极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王茗萱（2021）[16]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沪深两地2017年300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环保违规监管力度的加强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

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与计量，巴西学者Kumaran Rajandran（2016）[17]深入探究了100家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情况，基于排污、污水、废品、产品、运输等五个角度，提出了一种多准则的分类披露与评估方法，以期更好地评估企业的环境会计表现。Ming Li et al.（2018）[18]以合规性、相关性、可靠性等三个方面为标准建立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角模糊数的方法对评价信息进行了聚合。他们指出，将意见的一致性作为评价的权重，可以减少异常评价意见偏差的影响，得到更准确、真实的结果。

就国内而言，刘学文（2012）[19]运用模糊层级分析法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进行了构建，评价体系包含定性描述、定量描述、社会责任这三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从确定指标权重到建立模型等一系列步骤。张秀敏，汪瑾，薛宇等人（2016）[20]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挖掘并分析了2005-2010年中国大陆所有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文本，运用了多种Edi指标来衡量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字数、特征词数两种数量指标、0－1指标和一种质量指标这四种。王磊（2020）[21]以20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为研究对象，采用偏序集评价法评价了样本企业的披露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一，披露质量与公司所处地区、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因素有关，作者基于研究结果对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建议。

§1.3.2 外部监督研究现状

（1）关于媒体关注的相关文献

已有的大量文献聚焦于媒体关注的外部监督效应、公司治理效应，以及其产生的外部监督效应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Cho et al.（2009）[22]发现互联网信息的丰富程度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所获取信息的准确性，作为企业与社会大众之间信息的传播媒介，企业互联网网站中的环境会计信息越丰富，社会公众就越了解该企业的环境会计状况。 Evangeline（2011）[23]研究发现管理者会根据媒体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报道，有选择性地向外界披露相关信息，这表明媒体对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和影响力。LopinKuo&Vivian Yi-Ju Chen（2013）[24]的研究发现，环境新闻是社会大众了解企业的环境制度及其施行情况的主要方式，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对与企业形象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抑或单独的环境信息报告中自愿披露环境信息能够使得企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得到有效提升，并同时展示其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08046047140006115